

2012年度国家社科军事学项目课题

“军事外交视阈下的中美军事软实力比较研究”阶段性成果

项目编号：12GJ003-061

当代中国军事外交

历史与现实

The Contemporary Chinese Military Diplomacy: History and Reality

张 芳 著

时事出版社

2012年度国家社科军事学项目课题
“军事外交视阈下的中美军事软实力比较研究”
项目编号：12GJ003-061

当代中国军事外交 历史与现实

The Contemporary Chinese Military Diplomacy: History and Reality

张 芳◎著

时事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当代中国军事外交：历史与现实/张芳著. —北京：
时事出版社，2014.3

ISBN 978-7-80232-691-0

I. ①当… II. ①张… III. ①军事外交—历史—
中国—近现代 IV. ①E2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024482 号



出版发行：时事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巨山村 375 号

邮 编：100093

发行热线：(010) 82546061 82546062

读者服务部：(010) 61157595

传 真：(010) 82546050

电子邮箱：shishichubanshe@sina.com

网 址：www.shishishe.com

印 刷：北京百善印刷厂

开本：787 × 1092 1/16 印张：27.75 字数：348 千字

2014 年 3 月第 1 版 2014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8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自序

“军事外交是白丝绒手套下相握的铁拳”，无法让对方感知到力量的握手何以表达真诚与信任，又何以让对方相信患难之时的支持与扶助？如果说国家外交的实质是以综合国力为语言的政治对话，那么，军事外交的实质则是以军事实力为肌肉的握手。这是《当代中国军事外交：历史与现实》一书所欲引发的思考与共鸣。这是一项以现实问题为起问，以对可能答案的探寻为结尾的研究成果。

历史是过往的现实。无论历史怎样演绎，弱国无外交的命运从未被修改。弱国之弱多呈现三种姿态：一曰无“膝”，即军事力弱，如梁启超所云“外人咸以无战斗力轻我矣”。二曰无“脊”，即经济力弱，如人无脊梁，无以昂首挺胸于世界之林。三曰无“心”，即国家凝聚力弱，外患之时无以凝聚民心以共同抗敌。此三弱，无“膝”弱之累最甚，所以任公发出“必内有坚强之武力，然后能行用自卫之实权”的感叹。视外交力帮助武力如同左手帮助右手一样的孙中山，对借助外力实现民族之独立艰难奔走，最终四处碰壁的结果再次重现了“东西诸国，莫不磨刀霍霍，内向而鱼肉我矣”的结局。这是弱国形象中的中国命运，更是中华民族百年沉沦中从未停止奋争的历史图景，亦是作者用历史刻刀凿出的当代中国军事外交最初的历史轮廓。

中国历史的坐标在1949年发生了转折，中国人民站了起来，并

由此踏上民族复兴之途。历史正迅疾而悄然地向世界历史转变，中国人在对“中国与世界”问题进行思考的同时，也在思考着中国军队与世界各国军队的关系。当代中国军事外交循序地进行着不同主题的历史叙事，从生存到发展再到富强，主题变更下的中国军队的外交叙事折射的不仅是中国军队建设的侧影，同时也映照出为中国梦一直准备着的中国军人的命运。由此，作者完成了对当代中国军事外交历史脉络上的全景式雕刻。

现实是未来的历史。在对现实问题的探究中，作者的视线聚焦中国军事外交目标与现实之间、中国军事外交目标与能力之间的距离，解析并探索中美新型军事关系的建构，关注发展中的中国军事外交与发展中的军事对外传播问题，通过对钓鱼岛争端的跟踪研究完成了对中国军事外交中的法理运用问题的探讨，对于从平面到立体的中国军事外交风格的塑造，作者则通过数据和学术分析对诸要素互动与问题进行了积极的回答。至此完成了对当代中国军事外交的现实主义层面的雕刻。

研究在本质上应该是一种独立思考，研究者本质上应该是体味独立思考快乐的人。作为2012年度国家社科军事学项目课题“军事外交视阈下的中美军事软实力比较研究”的阶段性成果，在有所耕耘的基础上出版这些文字，其初衷也在于携这些文字加入到“军事外交”这个中国新辟学术园地的讨论中来，提出见解，供人检视，并使自己的观点更趋合理，夯实项目最终成果的学术累积，以使其趋于充沛、服务现实。

最后，作为新生学术领域研究的必然步骤，作者尝试对新中国建立以来的军事外交要事和2000年以来中国军队与外国军队进行的联演联训情况逐一收集汇总，以为更多研究者提供便捷的素材参考。虽然尽可能地运用了所能用到的资料搜索工具，但仍难免有挂一漏万之处，还望读者原谅。

目 录

导论	(1)
一、军事与外交	(1)
二、军事外交	(13)
第一章 艰难的起步：孙中山军事外交思想与实践	(19)
一、孙中山军事外交的基本思想及实践	(21)
二、孙中山军事外交的历史局限	(32)
第二章 战争中的成长：建国前人民军队的对外军事交往	(39)
一、建国前中国共产党的对外军事交往实践	(40)
二、建国前中国共产党对外军事交往实践的主要特点	(46)
三、建国前中国共产党对外军事交往对中国军事外交的深刻启示	(50)
第三章 1949—1978 年：生存外交中的中国军事外交	(53)
一、“一边倒”战略下的军事外交	(54)
二、“两条线”战略下的军事外交	(80)
三、“一条线”战略下的军事外交	(94)

第四章 1979—2009 年：发展外交中的中国军事外交	(113)
一、转折时期的中国军事外交	(114)
二、磨合时期的中国军事外交	(143)
三、调适时期的中国军事外交	(162)
第五章 2010 年至今：国际体系转型期中的中国军事外交 及其面临的挑战	(177)
一、2010—2013 年的中国军事外交	(177)
二、现实与目标之间	(185)
三、目标与能力之间	(204)
四、小结	(209)
第六章 理论·策略·机制：建构中美新型军事关系的 三重维度	(211)
一、中美非对称相互依存军事关系的理论分析	(211)
二、中美新型军事关系的建构策略	(218)
三、中美新型军事关系建构的机制需求	(225)
第七章 从被动到主动：中国军事外交的舆论运用	(231)
一、中国军事外交舆论运用的主要特点	(232)
二、舆论运用在中国军事外交实践中的作用	(234)
三、发展中的中国军事外交与发展中的军事对外传播	(242)
第八章 从说理到用理：中国军事外交的法理运用	(248)
一、法理运用在中国军事外交中的重要作用	(250)
二、钓鱼岛争端中的法理运用	(255)
第九章 从平面到立体：中国军事外交的风格塑造	(276)

一、军事外交主体的精神要素	(277)
二、军事外交的形式要素	(285)
三、要素的互动——问题及可能	(291)
 结束语：中国武装力量始终是维护世界和平和地区稳定的 坚定力量！	(296)
 附录：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军事外交要事记（1949—2013）	(297)
 2000 年以来中国军队与外军联演联训一览	(432)
 后记	(435)

导 论

“没有武力的外交就像是没有乐器的音乐。”^①

——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大帝

2012年9月，随着钓鱼岛事态的愈益发展，矛盾的发生与进一步恶化的态势看上去似乎就要超过可控的状态，中国媒体跟踪报道并聚焦最新动态，在主动权的掌握还未见分晓之际，有学者和媒体人发出这样的疑问：军事与外交运用的时机和尺度究竟该如何把握？在危机出现之前，是运用多一些军事力量还是多一些外交斡旋会使恶劣的情形有所改善？当时的争论，以及之后的进一步应对之策，其实质始终未能摆脱“军事与外交”，甚或是军事外交的范畴。

一、军事与外交

军事和外交同属政治范畴，两者都服务于国家政治，是国家政治以不同形式在不同领域里的延展，集中体现着国家意志。作为

^① Troy Stephen Goodfellow, “Period, Power and Purpose: Understanding Compil-
lent Threat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Ph. 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Toronto, 2000,
p. 1.

国家推行对外政策的两个最重要的手段，二者往往相互渗透，相互作用，有着天然的联系。以和平发展为主题的时代，军事似乎习惯以一个配合者的角色退居到同属于国家政治重要表达的外交身后，而一旦危机或者冲突发生，即使还没有吹响战争的号角，军事就被战略家们推向了国家政治的前台，公众也不由自主地将目光投向它，于是军事义不容辞地以威慑、干预、冲突或者战争的方式完成外交所未能完成的任务。问题由此而来，军事与外交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两者间又是怎样相互作用的？对军事和外交运用的极限和底线，即尺度是怎样的？这些问题的提出牵引着我的研究。

此前，人们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是怎样的呢？从纵向的时间轴上来看，自从有了军事、外交以来，军事与外交就总是以某种规律性步伐完成国际政治的探戈。这种规律性是否完全经验式地存在于人类过往的历史时空中？西方国际关系学界率先对这一命题作出了间接的回应，从汉斯·摩根索、托马斯·谢林、罗伯特·阿特、巴斯顿、戈登·克雷格和亚历山大·乔治都曾对军事与外交的关系、武力在外交中的作用、在对外政策中使用军事力量的动机、军事力量在对外政策中使用的限制等方面的内容有所涉及，国内学者张秦洞、汪庆荣^①、钱春泰^②、茅海建^③等也有相关研究。这些成果为军事与外交的研究提供了学术积累，但另一方面，专门的军事与外交的研究却有待于进一步耙梳使其更具逻辑性、系统性，更具有实证性，无论是从国内还是国外研究现状来看，这一主题的研究尚告阙如，有待开垦。

① 张秦洞、汪庆荣编著：《未来军事家丛书第38卷——军事与外交》，黄河出版社，1997年12月第1版。

② 钱春泰：《武力威胁与对外政策》，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1月第1版。

③ 茅海建：《近代的尺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版。

（一）军事与外交的关系状态

军事与外交相互作用的路径是对动态发展着的两者实现某一阶段性目标的过程考察。作为军事与外交交互作用的某一时间节点上的关系状态的考察则系静态考察。军事和外交作为一国政治的两个重要工具在无政府状态的国际体系下的国家意志的范畴内运行，国家目标作为国家意志的体现，实现对其牵引和导向，期间的相互作用往往产生四种状态：

一是军事与外交的平衡，这使得一国在对外关系中能够始终保持国家整体实力与外在环境的适应，即国际间力量的均衡。军事与外交的平衡状态意谓两者作为国家政治工具处于协调发展状态，其目标与国家发展目标保持着高度一致，并在相互协调中促进国家战略目标的实现。这种平衡不仅仅体现在一国国内的相关政策的制定上，更为重要的是体现在国与国之间的关系的协调发展中，即如果一国军事与外交达成了平衡，其在与大多数国家，尤其是大国的关系中总是处于一种相对稳定通畅的状态，这是国家权力发展稳定的外在当量。从国际关系的外部表现来看，治下和平或者处于均势状态即是这种关系的整体写照。

二是军事与外交的重叠，即在现代外交中愈益突现的军事外交的具体内容。从总体上来看，军事外交作为一个新的研究领域，还没有被普遍认同的学术定义，美国虽然没有明确提出“军事外交”的概念，但却将多种形式的军事外交活动纳入到了“非战争军事行动”理论中，并已付诸于实践。英国则使用“防务外交”的提法。与此相应，新加坡的官方言论中都曾使用“防务外交”的字眼，但鲜有对其进行定义。因此，军事外交的理论界定迟缓于实践探索，但各国已然将军事外交作为其实现政治和外交战略的必然组成部分。

三是军事对外交的僭越，军事裹挟了外交，改变了军事与外交

在国家意志隧道中向国家目标运行的轨迹，并进而冲撞了国际法、道义的要求，即我们通常所说的“武力的边界”。对于本应属于外交范畴来解决的问题，在还存在外交机会的条件下运用威胁或有限的武力来迫使对手放弃或取消已经采取的行动，而其运用军事的行为已经超越了武力的边界——国际法或者国际惯例的规定。譬如干涉行为，有部分学者混淆着使用它，使它具有了多重含义，甚至与强制性外交等同起来。这事实上已经有了打着道义的幌子而干了违反国际法规范的行为——因为不干涉主权国家的内部事务是国际法的一个基本规范。

四是外交对军事的折冲，外交无视或者回避军事力量的存在与运用，同样向偏离了国家目标的方向运转，虽然其直接取向是自我保护从而不影响国家目标的实现，但其实际结果却迟缓甚至影响了国家目标的实现，如冲突中的绥靖，或者大国政治中的推卸责任等均属于此。舒尔茨对温伯格说：作为国务卿，如果我的外交努力缺乏牙齿，我怎么能保护和推进美国的利益？^① 这话对于在某些决定国家命运的关键时刻，明明拥有坚硬的牙齿，却宁肯弃之不用而采用单纯外交妥协并最终酿成不可避免的战争的国家来说是一种极大的讽刺。但是，这是军事与外交之间的另一种状态，即在军事力量与威胁依然存在的前提下，一国在外交上采取让步意图缓和情势，而不是用既有的“牙齿”进行反抗或者对抗，在政治工具的运用上实现了事实上军事对外交的折冲。这种折冲在既有的人类战争和外交史上所展现的主要是绥靖，以及作为大国的推卸责任。然而，历史案例却让人清晰地看到达到意图的案例并不占多数。

^① [美] 戈登·克雷格、亚历山大·乔治：《武力与治国方略——我们时代的外交问题》，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1版，第368页。

（二）军事与外交的作用路径

军事与外交的互动通过两种路径得以完成：一是通过军事的外交，即通过军事的作用（军事后盾或者用武力、武力威胁）而促成的外交环节或任务的完成；二是通过外交的军事，即通过外交的作用而达成军事目标。

军事与外交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是中外学者都共同承认的观点，并认为应当综合运用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军事、外交等手段，来维护国家利益和实现对外政策目标。军事与外交作为一国实现其对外政策的基本工具，被认为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需要对其区别地、艺术地、谋略地加以运用。虽然从其本质上来看，两者在实现国家对外政策目标时的方式有着截然的不同，但在国际关系中军事与外交又是交替使用着的。也正因此，历史上有“谈谈打打，打打谈谈”，也有“以打促谈”，更有“边打边谈”的事件。通常一国在确立了对外政策目标后，多会首先选择和平的外交手段来解决，以降低实现政策目标的成本。但一旦这一政策目标诉诸外交手段失败时，就有可能促使一国运用军事手段来解决。

任何一种外交行为，无不是建立在一国军事力量存在的基础上，其外交的目标、范围、宽窄、能量的高低，影响的大小等都受到本国实力尤其是军事实力的制约。无关乎外交的主要内容和外交的实施主体，无论经济外交、文化外交、政党外交，还是体育外交、民间外交，所谓“弱国无外交”，没有以军事力量为后盾的外交无以展开，在这里军事不仅仅是工具性的一种存在，更是一种确保从事任何形式的外交主体安全以及平等享受国际关系规则的力量的表达，正如美国前国防部长威廉·佩里所说：“人们认为军队是战争工具，其实何止如此。”这一军事力量是基于“实体制裁的运用或是威胁运用……通过限制活动引发不安或者通过武

力控制他人对食物、性、安全度之类的需要之满足感。”在广义的外交路径中，军事具有极大的衍生效应，在国际政治领域里，只有军事力量的存在，其他外交形态才可能产生对他者引起重视的力量，譬如，物质商品作为奖励而使用明显具有了经济力，但当获利的期待由于主要物质资源的丧失而成为痛苦的威胁时，经济力就变成了一种强制力，而这一强制力的存在是以一国军事力量的存在为前提的。同时，在“运用‘接受程度’和‘积极回应’的方式达到提升目标行为的目的”的文化外交领域，也同样存在军事力量的影子，无论是文化外交的传播内容还是文化外交的交涉方式，自我秉持的“文化优越”和文化霸权的控制方式，或者被称为“软力量”的传统文化吸引力当中，就已然有着实力的因子。再如，在政党外交领域同样如此，对此，中国共产党有着切身体会。自中国共产党有了自己的第一支武装力量之时，就已经开始了与外国军队的军事交往。从南昌起义到新中国成立，历经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世界上几个有影响力的大国接连走近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在与之进行或长期或短暂的军事交往过程中，中国共产党清醒地认识到政党的地位决定了军事交往中的主动与被动，政党关系始终是建国前中共从事对外军事交往的标尺。中共并不享有对这一标尺的高低把握，而是始终处于这一标尺的测量与被牵引之中。而其根本原因则在于中共军事力量较之交往对象国的差异。中共军队与苏军的关系是对这一特点的典型写照。中苏军事合作，既是中苏两党关系的直接反映，又受制于两党关系，从而决定了军事合作中的主从地位。尤其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影响两者关系的不仅仅是中共与苏共的关系晴雨，苏共与国民党的关系、苏共的内部矛盾、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状况一起构成了中共与苏联军事外交错综复杂的关系网络。在这一相当长的时间里，由于中国共产党自身军事力量的不够强大，苏共实际上掌握着当时军事交往

的主导权，甚至可以根据对国际形势的判断和自身利益的需要而随时加强或中断这种合作。

从军事的外交路径来看，其主要表现方式包括：威慑、强制外交、危机处理、战争期间或者结束战争时的谈判。通过外交的军事主要表现方式包括：军事援助、海外军事存在、军事联盟、高层互访、军种交流、联合军演、军事互访等。

（三）军事与外交互动中的影响因素

军事、外交活动往往在复杂的国际环境和国内环境背景下运转，不可避免地受到国内外各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并通过军事与外交作用路径的选择为他国传递国家形象的认知信息。若就这些影响因素加以分析，可以通过个体领袖因素、国家层面因素和国际因素三个层面进行分析。参照卡伦·明斯特所提出的理论分析方法，以个人层次为分析，那么个体决策者、个体参与者的个性、认知、选择和行为将构成对军事与外交互动途径的影响因素。如果以国家层次或国内因素为分析，那么政府类型、国家利益、国家实力和地缘政治特点将构成对其互动的影响因素。如果以国际体系为分析，则国际战略环境、国际和地区组织及其优缺点将为其互动路径的选择提供解释。

1. 个人层次因素

（1）个体领袖因素

作为行为体，个体领袖在军事与外交互动方式的选择上发挥着重要作用。譬如2012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2013年3月全国“两会”之所以引起了国际社会的众多关注，其原因之一在于关系到中国领导层的变更，每当美国、俄罗斯这样的国家出现领导层变更时，也会出现关于该国外交政策可能变化的猜测。“这反映了一种普遍信

念，即个体领袖及其个性在外交政策方面的确重要。”^① 个体领袖受制于无政府状态的国际体系和国家利益，对于国家对外政策的选择有其必然的限制。明斯特认为，当下述三种情况中的一种情况出现时，个体领袖会影响事件进程：一种是当政治制度不稳定、不成熟、处于初始建设阶段，或遇到危机、崩溃时；当制度的制约非常有限时，譬如独裁政体中高层领袖就较少受到国内制度的制约；还有就是当面临的主要是边缘性、异常性或模糊性的问题和情况时。

(2) 特殊个体因素

这里的特殊个体通常包括依赖官方角色或通过拥有相关资源而在国际关系中能够采取行动并产生影响的个人。譬如，在美国对利比亚采取武力的决策中，奥巴马的国家安全顾问赖斯就对美国总统最后的决策实施了重要的影响。当然，也有一些个体并非通过官方角色而是通过个人的成功所形成的威望，比如诺贝尔奖获得者昂山素季领导反缅甸军事统治的群众运动。^②

(3) 普通民众因素

普通民众对军事与外交互动路径的影响往往是通过民意调查的方式反映出来。普通民众通过对外界信息的认知和选择形成意见，而当这一意见与一定数量的其他人形成共识、具有共同的心理反映时，这些公众意见最终形成的公共舆论就会对军事与外交问题的决策者产生影响。

2. 国家层面因素

在军事与外交作用路径的选择中，国家是关键行为体。对这一路径选择产生影响的一些重要方面，包括国家身份、地缘政治、国

^① [美] 卡伦·明斯特著，潘忠岐译：《国际关系精要》第3版，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7年3月第1版，第137页。

^② Marion Fennelly Levy, *Each in Her Own Way: Five Women Leaders of the Developing World* (Boulder, Colo.: Lynne Rienner, 1988).

家利益和国家实力。

(1) 国家身份

温特将身份分为四类：个人或团体身份、类属身份（社会身份）、角色身份和集体身份。这里讨论的是国家的角色身份，即由类属身份确定了一个国家在国际社会的位置，这也就决定了一个国家在国际舞台上所扮演的角色。国家角色身份的概念是指一个国家对自己在地区和国际社会中所处地位身份和所扮演角色的自我认定，国家一般都会依照这种角色、身份来实施自己的对外战略。同时，依照理性选择理论，国家通常会以此明确界定问题、确立目标、去做符合角色期望的事情，而并非仅仅为了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

(2) 国家利益

国家利益是国际政治中作用最为持久、影响最为深远的重要因素，是解释和判断一国对外政策行为的首要依据和主要分析工具。19世纪主持英国政务和外交的帕麦斯顿曾云：国家之间没有永久的朋友，也没有永久的敌人，只有永久的利益。汉斯·摩根索也曾有过同样的表达：只要世界仍旧主要由国家构成，那么在国际政治中实际的最后语言就只能是国家利益。国家利益是一个主观性和客观性辩证统一的概念，同时在发展过程中又表现出既有稳定性，又具有可变性的特点。关于国家利益的具体构成，学者尚无统一的结论，但认为其主要包含国家领土、国家安全、国家主权、国家发展等要素是一致的认识。并非所有的国家利益都排列在同一次序上，对国家利益的优先次序排列是否合理，决定了一国军事与外交目标设置的科学性。各国将国家生存与安全利益作为国家利益的核心和对外政策的最低目标是共同的作法。对于排在首要位置上的国家利益，国家对军事与外交的使用力度通常是最大的，其后渐弱。

(3) 国家实力

国家实力，是指一个国家所拥有的全部的实力和潜力（物质的和精神的）及其在国际社会中的影响力，它是一个国家在国际社会